

○ 陈克明 著

韩愈年谱
及诗文系年

○ 巴蜀书社

○ 潮汕文库 ○

HAN YU NIAN PU JI
SHI WEN XI NIAN

潮汕文库

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

陈克明 著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王大厚

封面设计:李文金

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

陈克明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028)5183822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5 字数 650 千

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20册

ISBN 7-80523-736-0/1·293

定价:4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

永远荣誉会长 谢慧如 陈伟南

荣誉会长 詹培忠

名誉会长 李景河 吴文宁 陈经纬 彭电武 詹伟山

名誉理事 陈厚宝 许哲铭 郭国英 黄玉莲 陈合春

吴喜然 苏章如 郭 宣

(以上按捐款额及姓氏笔画排列)

会长 刘 峰

副会长 麦友直 吴勤生 陈德鸿 杜经国 陈序藩

理事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伟斌 马友光 方木宏 方壮彬 刘幸福

孙振明 杜培锋 李福光 沈冰虹 陈 纤

陈少宏 陈作宏 陈武忠 郭以宁 黄绍生

曾桂清 谢秋城 詹友生 蔡松涛

潮汕文库

总顾问 吴南生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逸之 庄世平 刘思仁 许世元 李炯才
沈野 陈伟 陈伟南 陈喜臣 陈德辉
张湘伟 林川 周光明 赵贤明 饶宗颐
洪贤友 秦昌大 倪克屏 翁绍裘 翁锦通
詹培忠 蔡起贤

规划委员会

主任 刘峰

副主任 麦友直 吴勤生 陈德鸿 杜经国 陈序藩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伟斌 李衍平 杨方笙 陈历明 黄赞发
隗蒂 詹友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杜经国

副主任 黄赞发 杨方笙 陈历明 隗蒂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奎信 林伦伦 林淳钧 郭马风 黄挺
黄绮文 蔡仰颜

主办单位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

我常常回忆30年前，同样是“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初春季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老舍、曹禺、阳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几人，专程来访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独特的文化艺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的心。在这里，老舍先生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这时，我奉命来汕头迎候他们。当老舍先生等将回归北京的时候，一再握别叮咛：要珍重潮汕的文化遗产，要好好发掘和整理呀！可是，时隔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道。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繁荣发达。和全国一样，如何继承和发扬潮汕的优秀文化遗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重视。1990年11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

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1991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6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又议定着手筹建“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与此同时，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也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两个专门机构，密切配合，组织协调有关的研究工作。最近，他们商定了学术研究规划，决定出版《潮汕文库》，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整理出版一批丛书，包括《潮汕历史文献丛编》、《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等10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和专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工作。

潮汕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特别是两宋以后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细流。自唐、宋开始，潮州的瓷器就远销海外。随着岁月的迁移，潮州与海外交往也愈来愈加密切。潮人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中外文化在潮汕融聚化合，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大家议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使研究工作取得踏实、丰硕的成果，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

出版工作。现在准备出版的《潮汕文库》，就是按这一要求迈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完整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不免会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还是不少的，这些已经流传下来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有一个很能说明上述观点的事例：1956年初，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率领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日本友人赠送给两份明代戏曲刻本的摄影本，不知是哪一种剧种了。当梅先生等全团经香港回到广州时，刚好潮剧团正在这里演出《荔镜记》。梅先生等观看演出后，一查对才知道两份刻本都是潮剧的古本。这两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后又发现，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此件无刊刻年份，可能是万历初年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后又8年，即1964年，再发现有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潮剧刻本，卷一首题“潮州东月李氏编集”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是：1958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出土发现的嘉靖年间戏曲手抄本《蔡伯喈》（即《琵琶记》），戏文中夹杂潮州方言，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1975年12月又在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手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文中先后写明书写时间是

“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公元1431年、1432年）。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这些都是稀世之宝。上面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潮汕文化有丰富的遗产，也说明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宝贵文物、文献，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内外，有待我们去发现。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们和后人去做。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顺利进展，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1992年2月15日于广州

序

任继愈

古今历史人物，其功业足以不朽者，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代表旧时代的结束者，一种是代表新阶段的开拓者。像诸葛亮、文天祥、近代的章太炎，西方的黑格尔属于前者；像屈原、司马迁、近代的孙中山、鲁迅、西方的马克思属于后者。他们的业绩都足以传世不朽。韩愈也是我国历史上不朽的人物之一，他的功绩在于开拓新阶段。

安史乱后，人心厌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求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唐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社会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韩愈所提倡的排佛、古文运动、创立道统说，与社会发展、文学发展和哲学发展的总趋势符合。我们不能说后来的文学家、政治家、哲学家读了韩愈的书，才这样去做的，这里只是指出，韩愈的许多主张，符合历史潮流。韩愈的历史地位，宋以后被抬高。韩愈的著作，在宋以后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兴趣。韩愈还是那个韩愈，何以宋以后声价大增？这不能从韩愈本身找原因，只能从社会历史中找原因。韩愈是宋代哲学、文学界的先趋，他赢得宋人对他崇拜，是理所当然的。

（一）排佛

韩愈排佛是他的一贯主张。他的《谏迎佛骨表》，由于措词激烈，不避忌讳，给他招来一场灾难。韩愈排佛的理由都是前人已讲过的，没有比南北朝人更多的新见解。陈寅恪先生认为韩愈反对佛教，重点在于反对道教，道教在唐朝为患更甚于佛教。韩愈虽未公开指斥道教，实际上也抨击了道教。这是陈先生的新解释。如果我们作更进一步的探索，我们还会发现韩愈排佛教、道教，还包含反对藩镇割据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在内。

考察韩愈排佛，不应局限于排佛的文章的字句，更要注意排佛这一行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所起的作用。《礼运·大同》是在汉代提出来的学说。清末康有为变法，重新提出“大同”理想，撰写了《大同书》。康有为的《大同书》与《礼运·大同》思想大不一样。再比如“实事求是”这是我国古代成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拿来为唯物主义认识作注解，很恰当。“实事求是”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因为已在党内讲了几十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重新提出“实事求是”的口号，号召全党从“四人帮”设置的两个“凡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打破他们的教条主义，造神主义。旧口号有了新内容，以今例古，其理不殊。

安史乱后，唐朝藩镇割据，中央政令不能在割据地区贯彻，韩愈提出排佛，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他从维护封建传统的立场，指斥佛教是“夷狄”之教。因为它败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即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破坏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逃避了臣民的纳税服役的义务。照韩愈这个理论来衡量，当时败坏纲常名教、背离君臣大义、不为朝廷国家尽纳税服役义务的，除了佛教、道教以外，还有割据国土的藩镇军阀，他们破坏封建纲

常名教，没有履行臣对君的义务。藩镇割据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夷狄之道”。

韩愈的政治主张与他的排佛一样明确，他坚决主张削平藩镇，维护中央集权。裴度平淮西取得胜利，韩愈为之欢呼、歌颂。为了说服地方割据势力，韩愈不惜冒生命危险，与地方军阀开展面对面的辩论。可惜唐朝这个小中兴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唐宪宗因服道士药中毒而死，唐王朝权力落在历代宦官手中，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中国历史表明，巩固中央集权，消除割据势力，已成为唐末历宋、元、明、清的一贯发展趋势。韩愈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没有做到，经过多年的努力，宋朝做到了。宋以后未曾出现过地方割据政权。与宋朝并存的有夏、辽、金诸王朝，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分裂中央政权，闹独立的地方政权，与唐末藩镇割据政权的性质不同。宋以后，再未出现过地方割据政权，对今天来说，这也是相沿千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二）古文运动

文学，是社会活动的一面镜子，它对社会生活有反映，描述，评论，宣传多种功能，文学与社会生活相始终，社会不停地前进，发展，创新。社会在前进。文学也在前进。文学如同长江大河，上游水系不断增加进来，增益、丰富、充实着旧水系，而不是加入了新水系旧水系即停止活动。我国最早的文学创作《诗经》多采四言形式，后来五言，七言兴起，丰富了表达方式，而四言诗并未废除。律诗起于古诗以后，当时号为近体诗。近体诗盛行，古体诗并未废除。辞赋起于战国，盛行于两汉，但辞赋经历了两千

年之久，直到明清并未消亡。文化变革不同于政权更替，新政权建立之日即旧政权灭亡之时，文化则不能割断，新文化都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分支。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扩大了古文的运用范围，使古文进入文坛，受到社会重视。古文上台，并不意味着骈文下台。唐、宋古文盛行，骈文一直是官方通用文体，就政府公告，国家任免官吏，官僚政体考评，甚至一般社交函札，仍用骈体。韩愈的功绩并不是打倒骈文，而在于运用文学本身的魅力，扩大了文学表现领域。

韩愈把散文这个文学工具，运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用于墓志碑铭，文辞简雅，用于写事状物，能尽传神之妙，用于发抒胸臆，能无所不达。用于日常生活小品、杂文，能生动活泼，嬉笑怒骂，涉手成趣。他的《进学解》亦庄亦谐。《杂说》以小喻大，《毛颖传》寓苍凉于滑稽，有人读后不理解，只有老友柳宗元对它评价很高，比作“捕龙蛇、搏虎豹”一样的难于应付。韩愈的散文刚健清新而自然，“唯陈言之务去”，却不留斧凿痕迹，举重若轻。苏轼也是文学巨匠，而苏轼不免有文人夸大虚浮之气。这一点朱熹早已指出过。

除了散文以外，韩愈的诗也独辟蹊径。韩愈“以文为诗”，古今论者或以为功，或以为过。是功是过，这里不作评论。“以文为诗”，应当认为这是韩诗的特点，他打破了诗只限于抒情的旧传统，拓展诗的表现范围，这是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唐诗宏阔，宋诗深沉。从认识史的角度来看，由宏阔到深沉，是一个发展，表明诗在前进，这一变革，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手一足之劳。而是靠众多作家，共同努力，顺着文学发展趋势推动促成的。众

多推动者中，韩愈是重要的一员。

天地之大，品类之繁，世态变幻而恢诡，在韩愈眼下，没有不可以入文的，也没有不可以入诗的。语言这个文学工具，简直被韩愈用活了，竟做到无往而不适，无事而不宜。杜甫为诗，超逸绝伦，无愧于诗圣，但杜甫的散文的确不算高明，有时显得很不通顺。说到驾驭语言的功力，韩愈堪称超逸绝伦。

有人说韩愈诗风偏于险怪，认为这是韩愈自以为无法超过李白、杜甫，才力图以险怪取胜，这种评论是不了解韩愈，也低估了韩愈的文品。

文学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形象思维，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要求作家不但有语言技巧，更要看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及理解的深度。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韩愈的文学造诣，试把韩愈排在古代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比一比，韩愈比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稍逊，韩愈的文学造诣仍应属上品。

评价历史人物，既要看他本学科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又要看他本人的学术造诣。历史作用和作家本人的造诣，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不完全是一回事。韩愈的历史地位，有他开创新局面，推动学术发展的功劳，也有他创作的功劳。前者的功劳更大一些，因为他为后世开了风气。

（三）建立道统说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古代圣人历代相传的道统理论。道统说的提出是针对佛教而提出的，佛教道统说的建立，推广，流行，起于隋唐，盛行于安史之乱以后，隋唐佛教建立了各大宗派，各派有自己所依据的根本经典（比如华严宗依《华严经》，天台宗依《法华经》），对所依

据的根本经典各宗派有自己的解释，师徒世代相传，出现了解经的章句之学（如《法华文句》等），这种风气颇似汉代经学，经师相传授的章句之学。我称之为“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佛道统说，佛教宗派的建立，是同一事实的不同方面的表现。佛教中宗派都标榜自己得到释迦的真传。找不到文字根据的，则自称得到“教外别传”，“佛祖心传”。总之，都自称是佛教正宗，除教义上争正统，还在传法世系上来证明自己的宗派有渊源，是正统佛教。

安史乱后，佛教寺院经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僧众避乱，流动较大，经典散佚，有的毁于战火，各宗派为了保持自己宗派的纯洁性，更有强调传法世系的必要。如神会和尚在滑台召开的“南宗定是非论”，就是一次声势很大的法统之争，也就是佛教宗派中的“道统”之争。

韩愈的道统论，为后来儒教正式建立后的道统论奠定了基础。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指出，韩愈的道统论受佛教的启发，乃不刊之论。陈先生根据的理由是韩愈少年颖悟，随兄在岭南，在禅宗流行地区，必受禅宗影响。韩愈少年颖悟，对社会思潮有感应，自不待言。我们还应看到隋唐时期佛教势力最大，影响深远的地区，并不在岭南，而在中原，早在南北朝时期，禅宗已流行于嵩洛。安史乱后，中原地区佛教宗派之间的道统之争较偏远地区更加激烈，滑台之会，就发生在中原。当年惠能求法，在岭南无师可投，才奔赴湖北。韩愈生长于中原，当时佛教思潮弥漫于朝野上下，其影响不限于岭南一隅；长安、洛阳佛教宗派林立，不止禅宗一家。上有帝王、贵族提倡，下有百姓群众景从，佛道儒三家鼎立，各立门户，互争高低，构成隋唐思想界的总形势。

儒家在政治上占优势，其哲学思想，思辨分析，不及佛教深刻；业报轮回，三世因果之说，积数百年的宣传，已深入人心。儒家为了在三教中争取领导地位，力图论证儒教源远流长，得圣人真传，又由于受到佛教建立法统的启发，于是建立自己的道统论。

再进一步探本溯源，问一问佛教法统论又是从哪里来的？我看佛教各宗谱牒相传，以嫡系自诩，并非出自佛教自身，而是受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谱系之学影响，世间法影响到出世间法的结果。纵览天竺佛书及有关释迦及部派传记，他们一向缺乏时间观念，也没有一代一代严格记录习惯，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家族出身，关系到这个士族成员社会声望及政治升降。谱牒之学，在南朝成为显学，政府任命官员，必以族谱渊源为根据。伪造族谱者，置以重典。宗教号称出世，出世的宗教一刻也离不开世间。佛教的传世法系，所谓法统说，正是当时门阀士族世间法在出世间法的反映。

韩愈把世间封建宗法家族谱系学，移植为学术承传的学术谱系学——道统论。道统论形成后，再与封建宗法的政治承传关系相结合，于是儒家政治上的正统与儒家学术上的道统结合起来，韩愈在这一方面给儒家立了大功。

三教鼎立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儒以治世，佛以治心”之类的儒佛分工论，意思是说，儒教有治世的功能，佛教有感化人心的功能，说到心性修养之学，还得仰仗佛教，儒家为了夺取思想阵地，在治世这个功能之外，还要发挥“治心”的功能，道统说的实际意义，在于为儒家张目，宣布儒家不止有治世之术，儒家还兼有心性修养工夫。它有深远的思想渊源，它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学术嫡传正宗。道统说的建立，意味

着把天下一切学术（道）都纳入儒家门下，道统说，发端于唐代韩愈，完成于宋代朱熹。朱熹朝着韩愈指示的方向走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对韩愈的研究开展得不多，对韩愈的评价也欠公允。粉碎“四人帮”以后，纠正了学术界“极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学术界出现了新气象，沉寂的学术界活跃起来，研究韩愈的专著不下十种。陈克明同志的《韩愈诗文系年》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一部专著。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可信的背景资料，对今后的研究者无疑提供了方便。

陈克明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垂三十年，对古典文献整理工作有较深的素养，他通义理之学，又好词章之学，凭他的知识积累和勤奋的治学精神，写成了《韩愈诗文系年》，对今后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系年》的优点，一是详备，二是谨严。凡前人时贤的成果可采取者，尽量吸收，以期详备；诗文创作时间一时难以确定的，存而不断，以待后人。这两个优点，整理其它古籍也同样值得推广。

若干年来，学术界有一种风气，认为资料整理不算创造性的研究，写论文才算创造性的研究，有人把夸夸其谈当作了创造性，不务实、不从第一手材料入手，那样的“创造性”经不起风雨，不值得提倡。

研究韩愈，现在刚刚开始，在文献资料整理取得大面积丰收之后，才有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鄙薄资料工作，妄图一举写出创造性的著作，那是空想。盼望继《韩愈诗文系年》之后，对一些重要作家，写出大量有分量的著作，为后人提供资粮，铺平道路，我国今后的学术大繁荣就有了指望。